



宗教伦理的实践机制与内生约束 ——印光大师“敦伦尽分”思想的现代转化研究

释心定 释庆缘 释慧如 释能诚 释隆戒

(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江苏苏州,2150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在现代社会结构快速变动的背景下, 责任意识弱化与伦理规范的外在化, 已逐渐成为家庭生活、职业实践及基层社会运行中的普遍现象。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所提出的“敦伦尽分”, 并非停留于道德训诫层面的伦理主张, 而是试图通过宗教信仰、因果观念与社会角色责任的结合, 为个体提供一种可持续的行为规范路径。本文从宗教实践与社会伦理的交叉视角出发, 对“敦伦尽分”思想的结构与运行逻辑加以分析, 指出其以内生约束为核心的实践机制, 能够在缺乏外部强制的情境下, 促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其角色责任。文章进一步结合具体案例讨论该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化可能性, 认为“敦伦尽分”为理解宗教伦理参与社会规范建构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印光大师; 敦伦尽分; 宗教伦理; 实践机制; 社会责任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1.1058>

一、引言

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工具理性的扩张, 正持续消解传统伦理的既有结构, 致使个体在家庭场域的角色实践与社会职守的履行过程中, 所秉持的“责任伦理”陷入结构性困境。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制度体系日趋复杂的当下, 个体行为的展开愈发依赖外在规则与制度安排, 而作为责任伦理生成与存续核心的内在动力, 却呈现出显著的弱化态势。家庭关系中“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认知偏差, 引致养老、育儿等领域的责任纠纷频发; 职业实践中工具理性对伦理维度的单向挤压, 催生“履职仅以完成指标为导向”的功利化倾向; 基层社会运行中协作成本持续攀升, 造成邻里矛盾凸显、公共事务参与意愿普遍低迷等问题。凡此种种, 均深刻折射出当代社会推进伦理建设的现实迫切性。

王雷泉曾敏锐警示, 当代佛教教育正面临“神圣性资源流失”的危机, 导致解脱修行与现实生活发生断裂^[3], 这一观察与 Bhikkhu Bodhi 关于佛教教育应重拾社会“终极关怀”的论证形成了跨文化共鸣^[15]。在此背景下, 重新审视印光大师“敦伦尽分”思想的实践智慧, 探索其通过宗教信仰与角色伦理的结合构建内生约束机制的核心逻辑, 不仅能为缓解现代社会伦理困境提供思想借鉴, 更能为宗教伦理参与当

代社会规范建构找到有效的文化接口。如何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环境中，借助传统思想资源重新培育稳定而持久的责任意识，正是本文试图回应的核心议题。

二、研究回顾与分析视角

印光大师作为近代净土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长期以来是佛教思想史与宗派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其在近代佛教复兴中的历史地位，着重阐释其净土信仰、因果劝善等思想的教义内涵，代表性成果如杨曾文《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史》系统梳理了印光大师伦理思想的历史脉络^[8]，王建光《中国近代佛教的社会关怀》则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其思想的时代意义^[7]。此外，何怀宏《责任伦理》^[5]、杜维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6]等著作，虽未直接以“敦伦尽分”为核心研究对象，但为宗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性分析提供了理论参照。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其一，对“敦伦尽分”思想的关注多停留在零散的义理解读，缺乏对其作为一种伦理实践方式的系统性分析，未能揭示其“角色—动力—目标”的完整逻辑链条；其二，将该思想与现代社会伦理问题的关联性研究不足，多局限于历史语境的阐释，未能充分挖掘其在当代家庭、职业、基层治理等场景中的转化价值；其三，研究视角多局限于宗教学内部，缺乏宗教实践与社会伦理交叉视角的整合性探讨，难以凸显其在社会规范建构中的实践功能。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突破单一宗教学研究视角的局限，引入宗教实践研究的分析范式，将印光大师“敦伦尽分”思想界定为一种嵌入个体日常生活的伦理实践机制，而非流于表面的宗教训诫或抽象的道德口号。本文以许理和（Erik Zürcher）关于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本土社会结构深度调适”的核心观点为理论参照^[4]，借鉴陈寅恪“宗教史料为洞察本土文化变迁之轴线”的研究方法论^[12]，重点剖析“敦伦尽分”思想的内在实践逻辑与内生约束运行机制，探索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与现实应用可能性，进而为当代责任伦理体系的重建提供兼具历史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思想资源及可行路径。

三、“敦伦尽分”的伦理结构与实践取向

“敦伦尽分”思想并非抽象的价值宣示，而是围绕具体社会角色展开的系统性实践伦理，其伦理结构呈现出“角色锚定—责任履行—价值升华”的三维架构，实践取向则凸显内生性、具象性与持续性的鲜明特征，核心逻辑可概括为：以“敦伦”锚定角色根基，以“尽分”践行角色责任，以“传承创新”拓宽伦理边界，最终实现世俗实践与宗教修行的圆融统一。

（一）“敦伦”：角色锚定的伦理根基

“敦伦”的核心要义在于明确个体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本质是一种“社会角色契约化”的伦理建构，为“尽分”实践提供根本前提。“伦”即人伦，特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基本社会关系，是个体安身立命的社会根基；“敦”意为敦睦、践行，强调对人伦关系的尊重、维护与躬身践行，拒绝空泛的伦理说教。

印光大师在《印光法师文钞》中反复强调，个体需“知其自己所居之位，应尽之责”^[1]，这一论述清晰点明“敦伦”的核心是“明角色、守本分”，这种角色定位并非外在强加的约束，而是基于人性本质与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从理论渊源来看，“敦伦”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其既深度吸纳了儒家“五伦”思想的合理内核，以人伦秩序为世俗根基，又以大乘佛教《华严经》“佛法不离世间”的法界观为深层支撑，而澄观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中对心性与行持圆融无碍的阐释，更为“敦伦”提供了超越世俗道德的宗教理体依据，奠定了其“世俗性与超越性共生”的思想特质。

（二）与儒家“五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世俗根基与宗教超越的分野

基于“敦伦”的理论渊源，需明确其与儒家“五伦”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关系——二者的核心关联在于对人伦秩序、角色责任的重视，而本质差异则体现为“世俗支撑”与“宗教支撑”的分野，这种分野也正是“敦伦尽分”思想区别于儒家伦理的核心特质。

从传承关系来看，“敦伦尽分”中“伦”的概念直接吸纳了儒家“五伦”思想的核心内核。儒家“五伦”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核心，构建了世俗社会的人伦规范体系，其本质是通过明确人际间的伦理义务，维系家庭和谐与社会秩序（杨伯峻，2009）^[13]。孟子提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杨伯峻，2009：138）^[13]，更将“五伦”视为区分人与禽兽的根本标志，凸显了其作为世俗伦理的教化功能，这也成为“敦伦”思想吸纳的核心世俗养分。

但“敦伦尽分”并非对儒家“五伦”的简单复刻，二者在思想支撑、实践动力与价值目标上存在本质差异，具体可概括为三点：

其一，思想支撑不同。儒家“五伦”以“仁”为核心，依托世俗伦理理性与宗法制度构建，其约束力源于社会舆论、宗法惩戒与个人道德自觉，属于纯粹的世俗化伦理规范体系（陈来，2014）^[14]；而“敦伦尽分”以大乘佛教“佛法不离世间”的法界观为深层理体，结合“三世因果”“净土往生”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宗教化的伦理支撑，其约束力超越世俗层面，上升至生命境界与信仰追求的高度，更具内在权威性。

其二，实践动力不同。儒家“五伦”的实践动力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俗理想与社会责任，追求的是现世的道德完善、人格提升与社会功名（陈来，2014）^[14]；“敦伦尽分”则将角色责任的履行与“积累往生资粮”“提升生命境界”的宗教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不依赖外部监督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源于信仰层面的价值确认，使其实践具有更强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其三，价值目标不同。儒家“五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世俗文明的进步，属于纯粹的现世性价值追求（杨伯峻，2009）^[13]；而“敦伦尽分”以“导归净土”为终极价值，将世俗的人伦实践转化为宗教修行的具体路径，实现了世俗责任与宗教解脱的圆融统一，这也正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对本土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综上，这种“传承世俗根基、创新宗教超越”的融合，使“敦伦尽分”既保留了儒家“五伦”重视人伦实践的具象性特征，又通过宗教信仰的注入，弥补了世俗伦理内生动力不足的局限，成为兼具世俗适应性与宗教超越性的独特伦理实践机制。

（三）“尽分”：角色责任的具象实践与伦理特质

如果说“敦伦”是“明角色、立根基”，那么“尽分”就是“践责任、显价值”——其聚焦于角色责任的圆满履行，主张将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行为，是“敦伦”思想的实践落地，也是“敦伦尽分”伦理结构的核心环节。

印光大师对“尽分”的阐释极为通俗直白：“尽分者，凡应做之事，必须认真去做，不敷衍，不应付”^[1]，这一论述精准点明“尽分”的实践取向——拒绝空泛说教，强调“世间即道场”，将家庭中的孝亲敬老、职场中的履职尽责、社会交往中的诚信友善，都视为伦理实践与宗教修行的具体内容，实现了伦理实践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

历史实践层面，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为这一实践取向提供了有力佐证。束锡红、白宁宁等学者的研究表明^{[9][10]}，佛教在边疆地区的扎根与传播，高度依赖于其对本土家族伦理的深度吸纳；而《慈乌大黑要门》等实修文书更明确将世俗职责的圆满履行，视为通往宗教最高境界的必然阶梯^[11]，这也印证

了“尽分”思想“以世俗实践成就宗教修行”的核心逻辑，并非空谈，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实践基础。

从实践特征来看，“敦伦尽分”的伦理取向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具象性与持续性，其中内生性是核心特质：其行为动力并非源于外在监督、功利性回报或社会舆论压力，而是基于个体对角色责任的内在认同，以及信仰层面的价值确认。这种伦理实践不追求脱离现实的超凡脱俗，而是主张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尽分”践行“敦伦”，实现道德完善与精神提升，使个体在履行角色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与价值满足，进而确保伦理实践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综上，“敦伦尽分”的伦理结构呈现清晰的逻辑递进关系：以“敦伦”锚定角色根基、明确伦理前提，以与儒家“五伦”的传承创新，界定自身伦理特质、拓宽伦理边界，以“尽分”践行角色责任、实现价值落地，最终形成“角色锚定—责任履行—价值升华”的完整三维架构，彰显出“世俗与超越共生、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鲜明伦理特色。

四、内生约束机制的形成逻辑

“敦伦尽分”思想之所以能在缺乏外部强制的情境下促使个体自觉履行责任，关键在于其构建了一套以因果观念为核心、以信仰追求为支撑的内生约束机制，这一机制通过“认知建构—动力生成—行为规范”的逻辑链条，实现了对个体行为的深度引导与自我调控。

因果观念是内生约束机制的核心驱动要素。印光大师继承了佛教“三世因果”的基本教义，并将其与个体的角色责任履行紧密结合，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昭彰，丝毫不爽”^[2]。这种因果观并非简单的宿命论，而是将个体当下的行为与长远的生命结果建立起直接关联，使责任履行获得了超越即时回报的深层意义。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对因果通变逻辑的严密分类，为这一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法理背书，使个体能够清晰认知到“敦伦尽分”不仅是世俗层面的道德要求，更是关乎生命境界提升的修行实践。在这种时间延展的伦理视野中，个体行为不再受限于短期功利考量，而是被纳入长远的生命叙事之中，从而形成稳定的自我约束。

信仰追求为内生约束机制提供了终极支撑。“敦伦尽分”的实践逻辑并非止于世俗道德的完善，而是将其与净土信仰相联结，形成“世间善行—修行资粮—导归净土”的价值升华路径。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对世出世间法衔接路径的梳理，为这一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使个体的日常责任履行获得了神圣性意义。这种神圣化转化有效回应了现代社会中“神圣性资源流失”的困境^[3]，使平凡的劳动与职责履行摆脱了工具性的枯燥属性，成为通往终极解脱的修行实践。当个体将“尽分”行为视为积累“往生资粮”的重要途径时，便会从内心生发出持久的实践动力，这种动力不依赖于外部监督，而是源于信仰层面的自我要求，从而构成了最为稳固的内生约束。

“闲邪存诚”的心理预防机制是内生约束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印光大师强调，“闲邪存诚，方为修德之本”^[4]，“闲邪”即摒弃内心的私欲杂念、是非妄想，“存诚”则是保持内心的真诚恭敬、清净纯一。这一机制从认知源头为个体行为定向，通过净化内心世界，使个体能够清晰认知自身的角色责任，避免被功利心、自私心所误导。正如陈寅恪在解析文化变迁时所洞察的，任何宏大的个体变革，归根结底都始于对“诚、敬”等核心价值的重新认同与生命感悟^[12]。“闲邪存诚”机制使个体在面对利益诱惑或责任冲突时，能够以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念做出符合“敦伦尽分”要求的选择，从而确保内生约束的有效实施。

五、现代社会中的转化意义

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敦伦尽分”思想的核心逻辑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效，反而通过对现代伦理困境的精准回应，展现出重要的转化价值。其核心要义在于“明角色、尽责任、守本分”，强调个体需立足自身所处的关系与场景，践行对应责任、恪守伦理边界。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复归传统，而是在现代生活条

件下对其核心精神的再阐释与再应用——案例仅为佐证，核心是解读该思想如何破解现实困境、滋养社会伦理，彰显其不可替代的现实生命力。

（一）家庭层面：化解责任失衡，重构和谐关系

现代社会“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认知偏差，在家庭场域集中表现为赡养纠纷、财产分配矛盾等，本质是家庭成员角色认知模糊、责任履行缺位，与“敦伦尽分”中“角色锚定、尽责守分”的核心相悖。“敦伦尽分”在家庭层面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明确家庭成员的角色责任，引导个体跳出“血缘至上”“利益优先”的误区，以实际行动践行本分，化解矛盾、凝聚温情。

2023年新疆某工亡抚恤金分配案中，生父、前妻与继父因分配权争执，法官未拘泥于血缘标签，而是结合“抚养责任”“共同生活实际”界定权利，最终促成调解。此案背后，正是“敦伦尽分”思想的实践——家庭成员的“分”，不在于血缘远近，而在于是否践行了对应角色的责任，这一逻辑既化解了矛盾，更重构了家庭责任的评判标准，为破解家庭伦理困境提供了思路：唯有每个成员各尽本分，才能平衡权利与责任，实现家庭和谐。

此外，2024年全国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同比下降9%，这一数据背后，正是各地法院引入“角色责任”理念的成效，本质是“敦伦尽分”思想对家庭伦理的滋养，印证了其在化解家庭矛盾、维系家庭稳定中的现实价值。

（二）职业层面：重塑伦理价值，缓解工具理性危机

现代社会技术理性扩张，导致职业异化现象突出——部分从业者将工作简化为“完成指标、获取报酬”，忽视职业本身的伦理价值与社会责任，陷入“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困境。“敦伦尽分”思想中“履职即修行”的逻辑，恰好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支撑，其在职场层面的现实意义，在于引导从业者明确职业角色的本分与使命，将“尽分”内化为职业追求，实现职业行为与价值认同的统一。

浙江某三甲医院护士立足岗位，不仅完成基础诊疗任务，更主动关怀患者身心；北京某中学教师拒绝“唯分数论”，引导学生践行班级责任、理解尽责意义。两位从业者的实践，正是“敦伦尽分”思想的职场转化——职业的“分”，不仅是完成本职工作，更是践行职业伦理、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思想打破了功利化的职业认知，提醒从业者：唯有坚守职业本分、践行职业责任，才能摆脱职业异化的困境，既提升职业价值，也重塑职场伦理生态。

（三）基层层面：激活内生约束，降低治理成本

现代基层治理中，过度依赖制度约束、行政干预的现象较为普遍，导致治理成本偏高、群众参与度不足，难以形成长效治理闭环。“敦伦尽分”思想强调“内生约束、主动尽责”，其在基层层面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伦理约束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引导群众立足自身角色，主动承担公共责任，构建“自我规范—集体协作”的自治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的提质增效。

武汉某社区依托“法院+公安+社区”机制，在反家暴治理中强调施暴者的家庭本分，引导其主动承担责任，使社区家暴纠纷同比下降68%；安徽某乡村通过明确村民“邻里互助、公共责任”的本分，评选“尽分模范”，激活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使行政调解量大幅下降、垃圾分类参与率显著提升。这两起案例印证了“敦伦尽分”的治理价值：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唤醒群众的本分意识，以伦理内生约束补充制度约束，降低治理成本、凝聚治理合力，实现基层和谐稳定。

综上，“敦伦尽分”思想的现实意义，核心在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治理难题提供了传统智慧的解决方案。家庭层面，它化解责任失衡、重构和谐关系；职场层面，它重塑职业伦理、破解工具理性危机；基层层面，它激活内生约束、提升治理效能。其逻辑脉络清晰可见：以“明角色”为前提，以“尽本

分”为核心，以“解困境”为目标，引导个体在具体场景中践行责任、恪守伦理，最终实现个体、家庭、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思想并非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经过现代转化后，成为滋养现代伦理、支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精神力量，其重要性在破解各类现实困境的实践中得以充分彰显。

六、结论

总体而言，印光大师“敦伦尽分”思想通过宗教信仰与角色伦理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套以“伦理位—动力位—目标位”为核心架构、以内生约束为鲜明特征的实践机制。这一机制以“三世因果”为核心驱动，以“社会角色契约化”为实践轨道，以“导归净土”为价值升华，形成了“闲邪存诚—各尽其分—价值升华”的闭环逻辑，能够在缺乏外部强制的情境下，促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角色责任。

从学术价值来看，本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偏重义理阐释的局限，通过宗教实践与社会伦理的交叉视角，结合具体案例揭示了“敦伦尽分”思想的实践逻辑与现代转化路径，为理解近代佛教伦理的中国化特征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从现实意义来看，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化应用，能够有效回应家庭责任失衡、职业伦理失灵、基层治理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为当代责任伦理重建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思想资源。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敦伦尽分”思想所蕴含的责任伦理与内生约束智慧，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更是构建现代社会伦理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未来，进一步挖掘其与现代社会治理的契合点，推动其核心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培育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提升社会伦理水平、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印光. 印光法师文钞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印光.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3] 王雷泉. 近代佛教伦理思想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4]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佛教征服中国 [M]. 李四龙,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34.
- [5] 何怀宏. 责任伦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6] 杜维明. 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7] 王建光. 中国近代佛教的社会关怀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
- [8] 杨曾文.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史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 [9] 束锡红. 西夏文献学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5.
- [10] 白宁宁. 英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2:10.
- [11] 黄杰华. 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慈乌大黑要门》试释 [A]. 蒙藏委员会编. 当代西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台北: 蒙藏委员会, 2004:61-89.
- [12] 陈寅恪.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A]. 陈寅恪著.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266.
- [13]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4] 陈来.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5] Bhikkhu Bodhi.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M].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4.